

唐五代泉州城空间格局与规划方法研究

叶亚乐,武廷海^{*}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北京100084)

摘要:泉州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2021年成功入列《世界遗产名录》,城市规划研究对于遗产价值认知具有重要意义。梳理唐五代泉州城重大建设事件,划分规划建设阶段;考证各时期的城墙、城门、街道和关键要素位置,揭示泉州城四个阶段的空间格局。发现唐五代泉州城的关键要素以应门为中心、以50步为模数,呈环状或十字分布,空间格局呈现出明显的整体性;轴线和中心位置与周围山川和场地地形具有紧密关联,体现出山、水、城一体的特点。基于古代城市规画理论,总结唐五代泉州城“立极—正向—计里—为规—布局”的规划方法。建议加强泉州城市遗产的整体保护,突出规划遗产价值,将相关自然要素纳入保护体系之中。

关键词:空间形态;布局模式;规划方法;治所城市;规划遗产

中图分类号:TU9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2)06-0036-08

泉州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2021年成功入列《世界遗产名录》,泉州城遗产价值受到特别关注。从城建史角度看,唐五代是泉州城初建和成型的时期,宋元泉州城脱胎于唐五代城并继续发展,成为宋元泉州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物质空间载体。因此,探究唐五代泉州城的规划设计,不仅可以管窥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方法,而且有助于系统认知泉州建成遗产、发掘其整体价值。

目前对于唐五代泉州城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建设历史考辨和城廓范围复原两个方面,经过长期论争部分达成共识,但尚未形成定论^[1-9]。个别学者绕过关于建设历史和城廓范围的分歧,对山川、水系等自然要素进行梳理^[10],对衙署、街道、寺庙等城市要素的布局进行考证并尝试复原城市平面形态^[11],分析城市景观格局^[12],为探讨唐五代泉州城的空间格局和规划方法提供了必要条件。本文梳理泉州城市建设历史,复原泉州城各个时期空间格局,试图基于规画理论复原唐五代规划的可能过程,总结地方治所城市的规划方法。

一、建设历史与阶段划分

泉州城西倚群山,东临大海。近万年以来,近海岸线逐渐东移,晋江入海口大幅收窄,水陆空间格局变化较大。相关地质研究发现泉州古城范围内地下普遍存在海泥沉积物,表明泉州经历了沙洲岛屿成陆的过程^{[13]280}。据推算,9000年前古城地区尚在海中,5300年前仅昇文山突兀在海面之上。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年),西至开元寺南北一线,东至府后山、释仔山一线,南至庄府巷、凤池一线,形成一块面积较大、近似三角形的沙洲,为上岛聚居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由于上游的泥沙持续在泉州古城一带河岸堆积,唐代时原来处于水中的沙岛已与西侧山麓连接成一片,成为海陆之交;在北部清源山麓形成一串带状分布的湖泊,城东出现大规模的泻湖。随着人们持续不断地围垦,唐宋之际城北的带状湖泊基本消失,城东湖泊的面积也大幅缩小;城南的晋江河道内形成两个草洲,两侧分流形成港汊,南汊相对宽阔,为晋江主河道;北汊相对较窄,元代之后成为笋浯溪(图1)。地理环境的演变为泉州城空间发展提供了的基本条件。

收稿日期:2022-11-1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规画理论的大行山前古代府县城市规划设计方法研究”(51978361)

作者简介:叶亚乐(1991-),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城市遗产保护;武廷海(1970-),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城市规划设计。E-mail:wutinghai@139.com

^{*}通讯作者:武廷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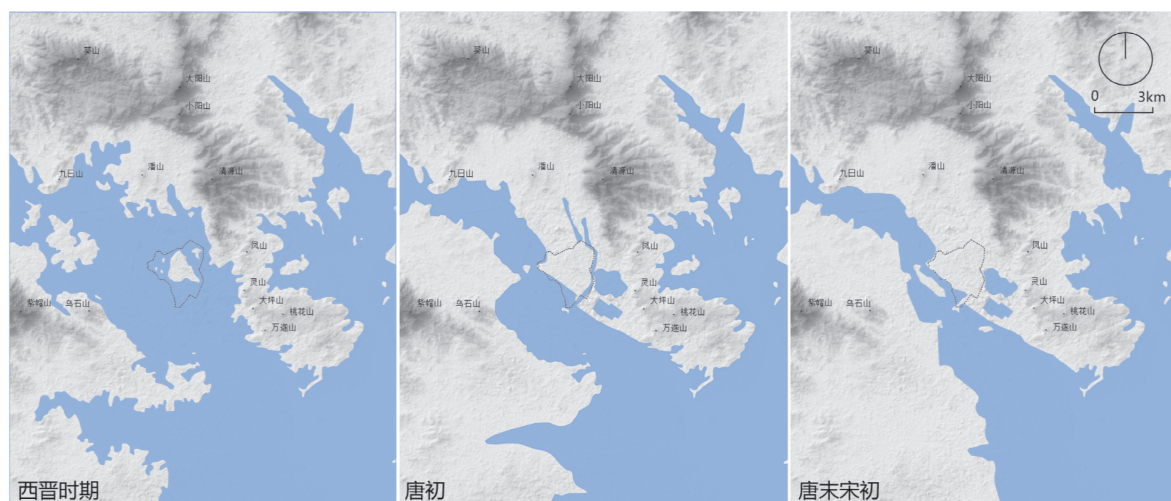


图1 三个历史时期泉州平原水陆空间格局^[13]

随着水陆格局变化,唐代初年位于今丰州镇的旧州城逐渐远离水岸,交通优势转移到水陆相接的泉州古城一带。为了便于海上交通和商业贸易,唐久视元年(700年)迁武荣州治于此。唐景云二年(711年)州名改为“泉州”,城市也始称今名。开元六年(718年),朝廷析州城四郊置晋江县,泉州成为州、县同城的城市。唐末五代时期,泉州逐渐成为地方割据的中心。唐光启二年(886年),王潮三兄弟攻下泉州,作为根据地进行建设。景福二年(893年)王潮、王审知攻占福州,进而占据漳州、泉州、福州、汀州、建州等五州之地,王氏家族建立闽国割据东南,并称王、称帝。期间泉州主要由王氏家族成员治理,是闽国仅次于福州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南唐灭王氏“大闽国”,在泉州置清源军,管理泉州、漳州9县,泉州成为州军级城市,节度使留从效在此开府建衙。次年,留从效驱逐南唐在泉、漳二州之驻军,名义上向南唐称臣,实际上割据一方,泉州成为割据政权的中心。北宋建隆三年(962年),陈洪进继任,直至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陈洪进纳土归宋,泉州的割据时期才正式结束。

对相关文献记载进行分类整理和比较研究发现,唐五代时期对泉州城空间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建城活动包括:(1)唐初始建子城;(2)唐贞元五年(789年)前,建设罗城;(3)唐天祐年间(904-907年),王延彬扩西罗城,包西禅寺;(4)南唐保大年间(943-957年),留从效在子城内建衙城,重新版筑并大规模拓展罗城;(5)北宋乾德初(963-964年),陈洪进扩东北罗城,包松湾崇福寺。鉴于唐代

子城和罗城的建设属于连续的规划建设行为,因此可以根据罗城范围的变化,将唐五代泉州城分为四个阶段,为唐代泉州城、王延彬拓展后泉州城、留从效拓展后泉州城、陈洪进拓展后泉州城。

二、各时期空间格局

唐五代泉州城四个阶段的城市范围各不相同,期间有子城、罗城、衙城三重城池,其中罗城为唐代兴建,五代时历经三次拓筑。理清各个时期的城垣、城门位置,是复原各个时期泉州城空间格局的关键。关于子城和衙城位置,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关于各时期罗城位置,目前尚存争议。因此,有必要综合运用历史文献、考古材料和历史卫片,系统考证各时期的城墙、城门位置,并复原主要街道和关键要素。

在相关文献记载中,子城位置较为清楚。明万历《泉州府志》卷四“城池”记载了子城形制:“子城……为门四,东曰行春,西曰肃清,南曰崇阳,北曰泉山。”^[14]1922年的《泉州市图》上明确标有子城四门的位置,行春门(东门)位于东街门楼巷口附近,肃清门(西门)位于西街井亭巷口附近,崇阳门(南门)位于中山路承天巷口附近,泉山门(北门)位于中山北路孝悌巷口附近。道光《晋江县志》详细记录了道光九年(1829年)子城城壕的具体线位,从侧面提供了城墙的位置信息^[15]¹¹⁷,与陈允敦的实地考察成果基本一致。综合以上文献记载和考察成果,可知子城城垣在“广平仓-米仓巷-泉山门遗址-土窟-崇阳门遗址-谢厝池南端-行春门遗址-

广平仓”一线。

关于衙城的位置,万历《泉州府志》卷四“城池”记载:“衙城……宋淳祐中旧址尚存,至洪武元年始废为卫”,表明衙城范围即明代泉州卫和清代提督署范围;东至今县后街一线,南至影剧院东西一线,西、北至子城城垣,周长约1 900米,与“周三里百六十步(合今1 984米)”的规模基本一致。衙城所处位置在唐代为州治,宋元沿袭,明代改为泉州卫。州治前有“双门”“应门”二门,正对崇阳门内的大道。其中双门为州治正门,又称“双阙”。《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二载明代史继偕《重修谯楼记》称,“谯楼(双门)相传为唐末王审知所建,前辟双阙,下累石如城”^{[16]265},但清道光《晋江县志》考证认为双门始于唐代。宋代时双门上有测漏所,为郡城之谯楼。元至正九年(1349年)重修谯楼并悬匾“威远”,因此又称“威远楼”。应门为州治第二门,在双门之北约90步(144米)。史继偕《重修谯楼记》称:“(双门)稍北九十步为应门。应门者,第二门也。”明代正统年间(1436-1449年),原处于唐代双门处的威远楼被烧毁,新建的威远楼移至应门处。此后历经重修,1966年的卫片上还能清晰看到威远楼——即历史上“应门”——的位置,在中山北路镇抚司巷口南。今威远楼为1989年重建,现址相比明代旧址偏北100米,相比宋元旧址偏北244米。

关于罗城位置,庄为玘、陈允敦和杨清江分别在1969、1978年和1996年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探访,发现了5处城垣或城壕遗存:(1)在附近的曾厝池南沿发现石砌的残留墙基,且走访得知泉州一中前的古城垣中曾经出土宋代瓷片,表明宋代的城垣经过此处;(2)在义成门发现南宋修城砖,表明南宋城垣经过此处^[1];(3)1978年忠义巷南端的原橡胶厂工地上曾发现过古城垣,城砖铭文为“嘉定三年修城砖”,表明南宋嘉定三年(1210年)的城垣经过此处;(4)西起原腐殖酸厂,东至朝天门,有长约里许的一段城垣;(5)在兵马司桥北发现水关和石砌壕岸遗存^[4]。此外,陈允敦结合地形、地貌、地名、桥梁位置和水系特征,认为通淮门至临漳门一线、二郎巷至忠义巷一线和爱国路一线的河道遗存为城壕遗迹,推测河道内侧曾为城垣^[6]。关于唐代西垣和西门的遗迹,考察成果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陈允敦认为甘棠巷一线的河道为唐代西壕遗存,壕内即为唐代西垣,

西门在甘棠巷口附近^[4];庄景辉推测奉圣巷一线为唐代西垣,西门在奉圣巷口附近^[9],但唐初奉圣巷一带尚未成陆,所以该结论成立的可能性不大。

1922年的《泉州市图》上绘制有清末泉州古城墙,以此为参考,在精确配准的1969年泉州卫星图上,可以识别出清末城墙的具体位置。将踏勘发现的城垣遗址与历史卫片上识别的城垣遗迹连缀、叠加,可以将清末泉州城分割为5个区域(图2)。与城墙建设相关的5座寺庙中,开元寺、元妙观、崇福寺旧址仍存,西禅寺在奉圣巷一带^[4],宁寿寺旧址在仁风门西北附近^[7]。根据5座寺庙的位置,结合王延彬拓城包西禅寺、留从效拓城包宁寿寺、陈弘进拓城包崇福寺的记载可知:(1)唐代罗城南垣在新门后街-金鱼巷-后城街一线,东垣在二郎巷-忠义巷-凤池巷一线,北垣在爱国路一线,在子城北共用北墙,西垣在甘棠巷一线;(2)王延彬所扩罗城西垣沿今城西路,自龙山寺至元培中学一带,与唐代旧罗城相接;(3)留从效所扩罗城规模较大,沿今城北路-文胜巷-西护城河西侧-津淮街西侧,与旧罗城相接,子城不再与罗城共用北墙,被完全包入罗城之内;(4)陈洪进所筑罗城在文圣街东段-崇福路一线。

结合历史文献记载、现状城门遗存和调查发现的城门与吊桥遗迹,可知唐罗城与子城共用北门泉山门,在中山北路孝悌巷口附近;南门为镇南门,在蓝桥(镇南桥)北;东门为行春门,在东街二郎巷口偏西;西门为素景门,在甘棠巷口附近。王延彬拓罗城后,西门移至明清义成门处,即今城西路与西街交叉口处。留从效扩展罗城后,新建朝天门,位置在今朝天门遗址处;西扩仁风门至明清仁风门处,在今崇福路与西街交叉口一带;南垣还有临漳、通津、通淮三门,形成了七门的格局。

城内的东西向道路可以追溯到唐代“仁风古道”,是建城之前连通此地与旧州城的山前大道。早期的白云庙(元妙观)和后来的开元寺均分布在古道两侧,商贾往来频繁。泉州建城后,古道成为东西大街。沿泉山门-崇阳门方向有南北大街,与东西大街交于双门之前,形成“丁字型”的城市干道;王延彬和留从效拓展罗城后,城市内的丁字街进一步向东、西延伸。根据上述考证成果,可以再现四个阶段的空间格局(图3)。



图2 泉州城遗址范围内的城墙遗迹与几处重要寺庙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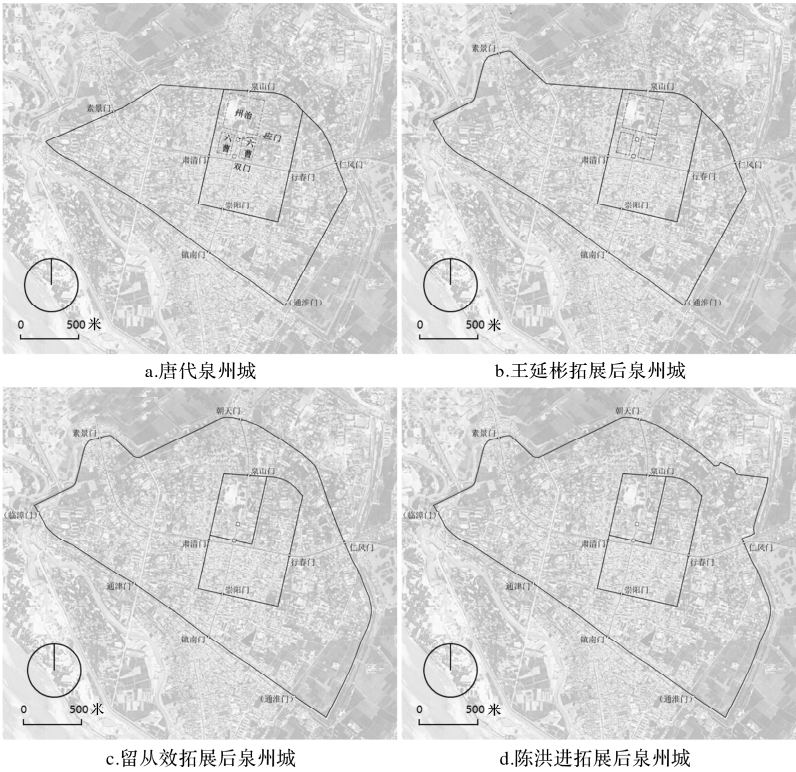


图3 唐至五代各时期泉州城空间格局

三、规划方法与过程复原

1. 唐代泉州城市建设规划

关于古代城市规划,武廷海提出“规画”理论,认为古代城市规划是运用规、矩、准、绳、表等工具,将人居与大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相地和营建的综合过程^[17];并建构了“仰观俯察-相土尝水-辨方正位-计里画方-置陈布势-因势利导”规画六法,作为中国古代城市规画的基本程序^{[18]15},并在隋大兴、六朝建康、元大都等都城规划研究中成功应用。参照都城“规画六法”,唐代泉州子城、罗城规划体现出“立极-正向-计里-为规-布局”的规划方法。

(1)立极。从隋大兴和六朝建康等都城看,中

国古代城市规划往往要选择形胜之处作为规划的中心和基点,即“立极”^[19]。文献记载表明,唐代泉州子城规划同样存在中心,位置在唐代应门处。明天启二年(1622年)史继偕所作《重修谯楼记》中,明确指出应门(即谯楼)地处城内七山之中,为地脉团聚之处:“说者谓郡城中含七山,斯楼实踞其中,以故人文甲天下,由地脉所团聚处。今兹一伤,治间山川,愈以开明灵秀,倍为映发,此岂独一测漏知时已哉?”^{[16]265}以应门为中心作缓冲区分析发现,云山、府后山、鹦哥山、释仔山、昇文山、虎头山等七山在距应门800步(约1200米)范围内环绕分布,应门大致处于这些高地的中心(图4)。可见古人在规划时有意以应门处为中心,以便最大化地利用地势较高的土地。



图4 唐子城、罗城规划示意(图上1格为50唐步)

(2)正向。轴线是中国古代城市空间布局的重要手法,体现出古人的礼制思想。子城内的泉山门、州治、应门、双门和崇阳门形成一条严整的轴线,方向为北偏东约 13.3° 。实地调查发现,在南北大街上向北望去,该轴线正对清源山主峰,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营建注重朝对山水形势的特

点^[20]。在技术方面,当时已经具备了实现三点一线的技术方法,包括地图术上的“测望法”和风水术上的“倒杖法”。通过仰观俯察、相土尝水、辨方正位,“立极”和“正向”在认知、理解、参与山水环境的过程中同时进行,在确定中心点的同时兼顾轴线的朝向。

(3)计里。子城城廓较为规整,平面近乎方形,东西约450步,南北约700步。应门距双门约100步,距西墙约150步;崇阳门与开元寺至应门距离相等,均为400步;肃清门和元妙观在中轴线两侧对称分布,且与应门的距离均为200步;子城的规划显然受到以应门基点,以50步(约76.5米)为模数的网格控制。唐子城的规模确定和空间布局过程中,很可能以50步为单位进行计里画方,作为基本的参照网格。

(4)为规。在建城之前,泉州古城一带已有白云庙(即后来的元妙观)和兴教寺(即后来的开元寺)两处重要建筑。其中白云庙为西晋时所建,唐神龙元年(705年)改庙为观,初名中兴观,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改为隆兴观,历史上一直是泉州最重要的道观之一。兴教寺为唐垂拱二年(686年)所置,初名“莲花寺”,长寿元年(692年)升为“兴教寺”,神龙元年(705年)改额“龙兴寺”,玄宗二十六年(738年)改额“开元寺”。泉州新城建设时,如何处理新建要素与已有要素的关系,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分析发现,肃清门和元妙观正门至应门距离相等,均为200步(约306米),且以南北大街为轴对称分布;崇阳门(南门)和开元寺至应门距离相等,均为400步(约612米)。以应门为中心,以200步为半径作圆,可以根据元妙观的位置确定肃清门的位置;以400步为半径作圆,可以根据开元寺的位置确定崇阳门的位置,并进一步确定西墙和南墙。东墙和北墙将鹦哥山和府后山等高地包入城内,形状较不规则,其位置选择明显受到地形条件的影响。这种通过作圆以确定要素位置的“为规”之法,强化了新旧要素整体性。

(5)布局。历史水岸的研究表明,唐初营建罗城之时,场地四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水岸的限制,罗城四至范围无疑是水岸或者台地约束的结果。但罗城城门的设置仍延续并发展了子城确定的空间秩序:镇南门在子城轴线的延长线上,略微偏西;素景门都大约与仁风门以子城轴线为对称轴均衡布置;仁风门与应门的连线垂直于子城轴线,形成十字格局,其延长线过甘棠巷口。这种严整的空间关系当是有意规划的结果。以应门为中心,东、西、

南、北四门处于四个正方位,该规划布局符合“天心十字”模式。规划时延长子城南北轴线至晋江岸边,确定为罗城南门;于应门处作南北轴线的垂线,与山前大道的交点处确定为东、西门。城门作为城市内外交通的结合点、城墙与主要道路的交点,其位置基本决定了城市的空间格局。

2. 五代泉州城的拓展规划

五代时期泉州城的扩建与割据政权的崇佛政策和当政者的崇佛思想紧密相关。当时福建虽然在形势上实现了统一,但实际上仍有多股独立的武装力量,为了团结豪强、扎根繁衍,进而实现长治久安,必须采取释道并重、兼祀巫觋的方针,因此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闽国长期施行崇佛的政策。另一方面,开国闽王王审知个人笃信佛法,诚心事佛,其个人信仰对其他王氏家族成员和士人、武将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统治阶层的带领下,闽地的僧团和信众规模空前,崇佛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和普遍现象。留从效和陈洪进任清源军节度使后,延续了王室的崇佛政策。此外,商业的繁荣推动了城市空间的发展。王审知偏安东南后,将发展商业贸易作为推动地区发展的国策。他免除苛税,提倡自由交易,发展贸易市场;开放商业运输,以致商船遍布四郊和城下。王延彬在泉州提倡海外贸易。留从效执政后,不仅鼓励当地商人远泛藩国,而且招徕海上外国商贾。

在崇佛和重商思想的影响下,泉州城内外接二连三兴建佛寺,并先后拓展罗城包重要寺庙入城,同时增加商业贸易空间。寺庙成为泉州城内重要的城市景观,主要寺庙的布点延续并强化了以应门为中心、以南北大街为轴线的城市空间格局:留从效所建承天寺、封崇寺与已有开元寺、水陆寺分布在以应门为中心、以400步(约612米)为半径的圆周上,形成环护之势;新建的西禅寺和唐代所建东禅寺以应门为中心,基本对称布局,且和昇文山、虎头山与应门间距离大致相等,均为800步(图5)。此外,留从效新建的朝天门、仁风门与原镇南门与应门的距离大致相等,均为600步。强烈的秩序性表明,五代泉州城的拓展规划以应门为中心,以50步为模数,通过“为规”指导新建城门和寺庙的可能位置,强化原有空间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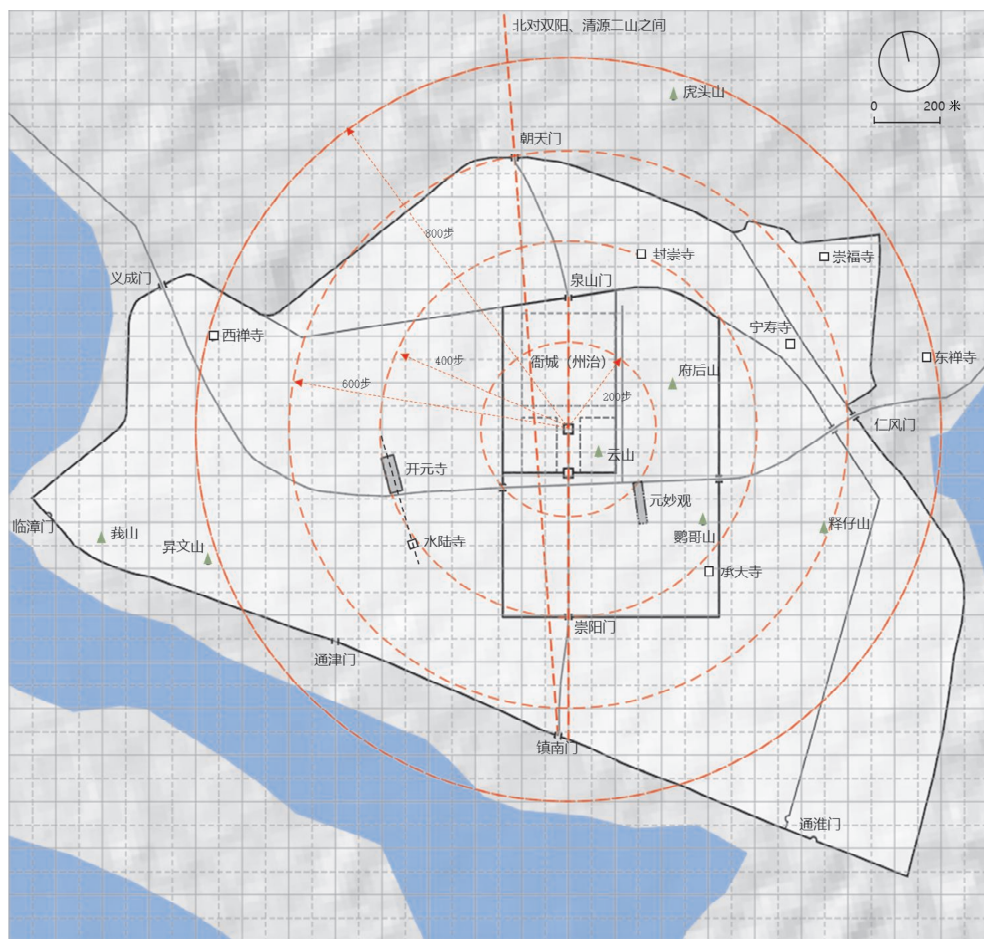


图5 五代泉州城规划示意(图上1格为50唐步)

总的来看,唐五代时期的泉州子城、罗城和拓展罗城的规划一以贯之,以应门为中心,通过立极、正向、计里、为规、布局的方法,安排新的空间要素,构建并持续强化自然要素与人工要素之间和新、旧要素之间的整体性。

四、结 语

基于文献资料、考古发现和遥感数据,揭示了唐五代泉州城的历史格局。泉州子城建于唐初,罗城建于唐贞元五年(789年)前,衙城建于南唐保大年间(943-957年),五代时期王延彬、留从效和陈洪进曾三次拓展罗城。唐代罗城东垣在二郎巷-忠义巷-凤池巷一线,北垣在爱国路一线,西垣在甘棠巷一线;王延彬所扩罗城西垣沿今城西路;留从效所扩罗城沿今城北路-文胜巷-西护城河西侧-津淮街西侧,与旧罗城相接;陈洪进所筑罗城在文圣街东段-崇福路一线。

本文定量诠释了唐五代泉州城市布局的整体性特征:唐五代泉州城的城门和寺观等关键要素,

以应门为中心,以50步(约76.5米)为模数,呈环状分布或十字分布,空间格局呈现出明显的整体性。将规画理论应用到地方治所城市研究中,总结了唐五代泉州城“立极-正向-计里-为规-布局”的规划方法,在遵循因地制宜原则的同时,控制关键要素的布局,在自由形态中创造内在秩序性。

唐五代泉州城传承发展至今,成为宝贵的规划遗产。历史上规划确定的寺庙、城门和应门(谯楼)等建成要素和清源山、晋江等自然要素,其空间布局具有内在的整体性,其价值内涵上存在一定关联性;这不仅是当下泉州城市遗产的特点,而且反映了中国古代城市的空间特征和规划方法,承载着中华文明注重整体生成论的鲜明特色。建议加强泉州城市遗产的整体保护,彰显古代规划背后的文化内涵,突出由规划所形成的空间联系,并将相关自然要素纳入保护体系之中。

致谢:感谢王学荣、汪勃对本研究提出的宝贵意见。

参 考 文 献

- [1] 庄为玠. 泉州历代城址的探索[C]//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9: 367-379.
- [2] 庄为玠. 泉州古城址的再探索[J]. 社联通讯, 1985(4): 1-8.
- [3] 庄为玠. 三探泉州古城址[J]. 泉州学刊, 1986(5): 17-20.
- [4] 陈允敦. 泉州古城踏勘纪要[J]. 泉州文史, 1980(2): 1-13.
- [5] 陈允敦. 期望庄为玠教授对泉州古城的三探索[J]. 泉州学刊, 1986(2): 1-5.
- [6] 陈允敦. 泉州子城和罗城的创建孰先孰后[R]. 泉州市志编纂委员会, 1987.
- [7] 杨清江. 泉州古城址踏勘与唐故城址钩沉[J]. 泉州文博, 1998(7): 25-40.
- [8] 庄景辉. 泉州子城址考[J]. 福建文博, 1987(2): 159-164.
- [9] 庄景辉. 泉州罗城址考辨[J]. 海交史研究, 1988(2): 119-126, 118.
- [10] 陈名实. 泉州古城建筑与风水[J].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5(5): 32-39.
- [11] 孙丹妮. 基于历史地图转译的泉州老城历史空间变迁及历史空间网络建构初探[D]. 南京: 东南大学, 2011.
- [12] 张阁. 古代泉州城市景观体系研究[D].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2018.
- [13]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福建省历史地图集[M]. 福州: 福建省地图出版社, 2004.
- [14] 阳思谦, 徐敏学. 万历泉州府志[M]//刻本. 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卷四.
- [15] 吴之醵, 周学曾, 尤逊恭. 道光晋江县志[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 [16] 怀荫布, 黄任, 郭麐武. 乾隆泉州府志: 一[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 [17] 武廷海. 从形势论看宇文恺对隋大兴城的“规画”[J]. 城市规划, 2009(12): 39-47.
- [18] 武廷海. 六朝建康规画[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 [19] 武廷海. 画圆以正方——中国古代都邑规画图式与规画术研究[J]. 城市规划, 2021, 45(1): 80-93.
- [20] 王树声. 结合大尺度自然环境的城市设计方法初探——以西安历代城市设计与终南山的关系为例[J]. 西安科技大学学报, 2009, 29(5): 574-578.

A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Planning Method of Quanzhou City in th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YE Ya-le, WU Ting-hai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Quanzhou, a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was successfully inscribed o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in 2021. It is significant to study its urban planning to understand its heritage value.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stages of Quanzhou City in th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could b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construction events and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city walls, city gates, streets and other key architectural elements reveals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Quanzhou City in four phases. It is found that the key elements were distributed in rings or crosses with Yingmen Gate as the center and 50 bu (about 76.5 meters) as the modulus and the spatial pattern shows an obvious integrity. The urban axis line and center are constructed in harmony with the topographical landscape, thus embodying the features of mountain, water and city as a whole. Based on the planning theory of ancient Chinese cities, the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planning of Quanzhou in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followed the pattern of “center selection, orientation adaption, grid arrangement, circular distribution and structure determin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an overall protection of the city heritage of Quanzhou should be enhanced by highlighting the heritage value of the planning and incorporating relevant natural elements into the protection system.

Key words: spatial structure; layout mode; planning method; city administration; planning heritage

【编辑 吴晓利】